

米蘭外方傳教會士來華拾遺

梁作祿著
林瑞琪譯

在一個世紀前，一八八八年的夏天，一位意大利籍傳教士主教，獨自乘舟沿黃河南岸緩緩前行，視察受洪水蹂躪的地方。黃河汎濫，為這一帶人口稠密的地區帶來鉅大的災禍。五十七歲的安西滿主教（Volonteri）一心想盡點辦法賑助當地的天主教家庭及任何其他能夠接觸到的非基督徒。（註一）

早在十七世紀，耶穌會經已到河南省傳教。其後儘管困難重重，但福音仍能流傳不斷。遣使會也在當地服務了近一百年，至一八六九年，安西滿主教帶著幾位意大利教士來接掌教務。他們屬剛到中國傳教的米蘭外方傳教會（後改稱宗座外方傳教會），該會於一八五零年由隆巴狄地區的多位主教所創立。該會的首批工作之一，是在一八五八年赴英屬的香港服務，在當地的工作至今仍未中止。事實上，安西滿主教也是首先到達香港，以後才開始他在華的宗徒事業。

安西滿主教抵達河南省後的二十年間，不少傳教士加入他的行列，但可惜其中很多都先後病逝，逝去者有些尚在英年。他們在農村的傳教方法十分傳統和簡單，挨戶探訪散落的教友團體，鞏固他們的信德，拓展接

觸面，藉著照顧病者、收養棄嬰、照料老人等慈善工作去為福音作證。在監牧區中心，他們設立基本的組織，以培訓本地教友領袖，及援助不幸者或孤兒。不久，安主教感覺到，建於毗鄰南部城市南陽的靳家崗傳教中心，很難照顧到整個委託於他們的河南省。因此他建議把傳教中心一分為二，並於一八八四年達成心願，儘管人力短缺，仍能在黃河以北成立一個新的監牧區。（註二）

原有的南陽監牧區不斷向外劃分，標誌著教會在河南的成長。到一九四六年中國聖統制確立的時候，全河南共有九個教區，且仍有共六十九位宗座外方傳教會的神父在其中三個教區服務（包括開封總主教區、南陽教區及衛輝教區），與三十三位中國籍神父並肩工作。此外，另有二十位意大利傳教士自一八八七年起，在陝西漢中教區工作。當地同樣是農村及未開發的地方。

米蘭會與巴黎外方傳教會及其他在十九世紀成立於不同國家的傳教會一樣，在教律觀念上都不是修會團體，而是專務傳教工作的教區司鐸組織。因此，他們以不吸納任何傳教區人士加入自己的組織為榮，且視此為

當守的義務。相反，他們全力培育本地神職人員，並確立目標，要儘快把牧放這新成立的基督徒團體的責任轉到本地神職人員手中。這亦是安主教及他的繼任者所最關注的事情。一八七零年，安主教確立新家崗修院的體制，使它成為教區內最重要的學術機構。一九三二年在開封市郊又建立了一所新的修院，院舍是傳統的中國建築，為整個河南省提供神哲學教育，師資則主要來自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

Paolo Manna 總會長神父是一位神恩性的人物，於一九二七至二八年間訪問所有委託於宗座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區時，一再申明傳教工作的目的就是「消滅自己」，意即外籍傳教士應盡量協助新的基督徒團體成長，好能早日走上軌道並成為自給自足的教會。過訪河南時，Manna 神父高興見到遼闊的南陽監牧區內，有部份地區已經充分發展為一個獨立的傳教區，並委託於本地的神職人員負責。首任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這些事實都說明了外方傳教會組織可以「本地化」的，並在相當短的時期內變成「中國教會」。（註三）事實上，當中國教區長馬昌仁出缺之後，王伯祿神父立即獲委任為駐馬店教區主教。

傳教工作所涉及的困難當中，最使安主教感到困擾的是鴉片煙的流毒。一八三九年在廣東省發生鴉片衝突及列強在中國強迫滿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後，鴉片的為禍愈演愈烈。結果，在中國各個階層的人士染上了鴉片煙癮者不斷增加。安主教及他的同工驚覺到鴉片煙對個人及家庭的毒害。雖然於一八八七年五月在漢口舉行的第二屆地區教

務會議上，未能把鴉片問題納入議程，但安主教並未因此而氣餒。同年十月，他向教宗呈遞了一份詳盡的報告，懇求教宗協助中國政府對付這社會大敵。他堅持不懈，得到的回音是這問題將會接受進一步的研究。結果，在一八九一年末，教廷公布訓示，明令禁止基督徒買賣及吸食鴉片，斥這些為嚴重不合法的事。（註四）這訓令成為整個中國教會的立場，其後於一九二四年在上海舉行的第一屆全國天主教會議上再獲確認。

這樣一來，引發了我們觸及一個在談論十九世紀的基督宗教傳教工作時所不能避免的敏感問題。抵制鴉片肯定會影響西方列強的政治及經濟上的利益。西方列強以軍事力量壓制清政府。問題之所以這樣複雜，出於自一七一七年起，基督宗教在中國已遭全面禁制，教會亟欲在中國爭取多一點宗教自由。西方的輿論因此認為，列強應該為傳教士在中國爭取宣教及傳揚福音的權利。但似乎很少人關心到，列強以中國宗教自由的守護者自居。（其實他們在自己的家鄉卻十分俗化，有時甚至是反宗教的。）

任何有地位的歷史學家，都不會否認天主教基督教的傳教士中，有不少曾藉著西方列強所提供的「保護」來討個方便，或藉著殖民主義者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而取得某些「特權」。

不過，另一方面，歷史研究也不能以偏概全，而忽略了「實事求是」這至理名言。的確，宗教與政治這些不名譽的結合，引致很多愛國的中國知識份子對福音的宣傳事工產生反感。很多地方官員施予各地教會的困難，也可以歸究於這種氣氛。一九零零年的

義和團排外滅教運動，也是在這種心態中形成。不過，可以肯定絕大多數傳教士與政治事務無關，他們全心專務福音上的靈性事業。他們大多數從未支持西方列強。他們早已準備為作證信仰及牧養羊群而付出最高的代價。宗座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當中，郭西德神父（A. Crescitelli）在一九零零年死於漢中的教難中，他已受封為真福。另外七位會士在一九四零至四二年，因為不願放棄處於日本侵略部隊與中國抗敵部隊之間的教友團體，因而在悲慘的境況中被殺。（註五）

對於西方列強所提供的「保護」，由於帝國主義者以基督宗教的保護者自居，因此好些傳教士早已看出存在著角色混淆的危險。在南陽的安主教，以及他在衛輝的會友司德望主教（Scarella）都看到這一點。他們剛開始在河南工作時，安主教即已懷疑法國為傳教區所提供的保教權是否有效力。一八八一年，在他呈上傳信部的報告當中，他建議教宗直接與清廷建立關係。這項建議在日後中法安南戰爭（一八八三年）發生時，更顯出別具眼光，這場戰爭後來引起中法兩個大國在一八八四年直接衝突。

一八八五年，教宗良十三世派私人特使瑞良（Abbe Giulianelli）自羅馬到中國，向清廷呈遞國書，表達教宗對光緒帝的敬意，並冀請保護傳教士。一位法國史學家記載說，瑞良的出使促使總理衙門及軍機大臣李鴻章產生了一個念頭，希望破除法國對所有外國傳教會所擁有的保教權。（註六）一八八六年，李鴻章主動向教廷建議互派使節。教宗欣然接納，並委派Agliardi總主教為外交使節；由於法國政府強烈反對，並以法國

國內的教會為要脅，以致事件被迫擱置。（註七）

與此同時，意大利政府利用中法關係緊張的機會，希望取得對在華意籍傳教士的保護權，德國政府亦有同樣的打算。安西滿主教及司德望主教毫不猶疑地對這建議表示強烈的反對，傳信部也支持他們兩人的看法。安主教堅持希望教廷與中國直接建立關係。一八九五年，他致函傳信部說：「我一向認為我們應依賴的是一位宗座代表，而不是法國的保護，我認為這種想法至今仍然正確無訛。」一八九八年，教廷再嘗試委派宗座特使，同樣未能成功。（註八）一九一八年，中國外長陸徵祥（教友）嘗試與教廷建立外交關係，同樣因法國的阻撓而失敗。即使一九二二年剛恆毅總主教以宗座特使身份來華時，也受到多方面的反對。在這個時候，另一位宗座外方傳教會士譚維新主教（Tacconi）成為開封代牧，他寫信給剛恆毅主教道：「你的工作起碼能令中國政府明白到，教宗是決心放棄列強的保教權，好能走上獨立的道路，免受政治利益的操縱。」（註九）

要講述宗座外方傳教會在英屬香港的一百三十年服務歷史，大概得另立一章才成。在香港，天主教會起初人數甚少，也沒有甚麼影響力。而教會今日在教育及慈善事業方面對社會有莫大的貢獻，備受推崇，這一切都有賴神職人員及教友的傑出表現，及歷任主教的出色領導。這些主教包括自首任的高主教，以至最後一位意大利籍的白英奇主教。白主教堅持要退位，終於在一九六八年獲准，並把教區交給中國籍的徐誠斌主教。

（附註 見五十九頁）